

移民与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1860—1911)¹

白宏钟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1860年清廷开禁东北之后, 移民大规模涌入东北, 同时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也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发展。在1860—1911年期间的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 移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移民增加了东北的人口, 推动了东北农业的进步, 并且在近代工业、城市的发展等其它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 由于建设近代社会文明的特殊要求和移民自身特点的限制, 移民在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过程中始终不是主导力量, 也不是主要动力。不过, 移民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具有可塑性强的特点。

关键词: 移民; 东北; 近代化; 1860—1911年

中图分类号: K **文献标识码:** K

移民是近代东北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有清一代, 清政府对东北的政策从奖励移民到封禁, 最后又开禁, 但是关内居民向东北的移民则从未停止过。尤其是清代后期东北开禁后, 移民迅猛增加, 大大加速了东北开发的脚步。毫无疑问, 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与移民是密不可分的, 将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 在上个世纪20到40年代曾出现过一个高潮, 先后有萧一山、稻叶君山、吴希庸等国内外学者发表或出版了有关的论文和著作; 1980年以后, 这方面的著述又逐渐增多, 如近年来出版的葛剑雄主编的多卷本《中国移民史》和路遇主编的《中国人口史》都有东北移民史方面的内容。东北师范大学张士尊博士的毕业论文《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1644—1911》收集了丰富的清代东北移民史料, 是笔者所见到的近年来关于清代东北移民问题的比较全面、详细的著述²。关于东北的近代化问题, 一般的东北近代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 不过这方面的专著笔者尚未看到过。在涉及这一研究领域的论文中, 衣保中有关东北农业近代化问题的论述富于卓见, 非常值得注意。至于将移民与东北的近代化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则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专门的论著, 这个领域目前可以说还基本上是空白的。笔者不揣浅陋, 谨以此文为芹曝之献, 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笔者在本文中使用了“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这个概念时, 将其完全等同于“近代化”。之所以在题目和文章中的大部分地方采用前者, 是因为本文并未全面分析东北近代化的所有方面, 只是选取了其中最主要的几个方面结合移民的因素进行分析, 使用“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这个说法, 更能体现出笔者的解构分析的意图。笔者在本文中使用了“近代化”和“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这两个概念时, 对它们的界定是这样的: 首先, 近代化或称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 是一个过程。“最好把现代化看作是涉及社会各个层面的一种过程。”³ (这里所说的

¹ 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王先明教授的悉心指导, 笔者向王先生深表谢意。

² 这篇论文可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网站上浏览, 提交日期为2003年4月1日。

³ 《中国的现代化》,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本文的写作得到了王先明教授的悉心指导, 笔者向王先生深表谢意。

³ 这篇论文可在“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网站上浏览, 提交日期为2003年4月1日。

“现代化”，和我们所说的“近代化”是同义的。)尤其在中国，这个近代化的过程是异常艰难而缓慢的。其次，“近代化”不等同于“西化”、“工业化”或“资本主义化”，它的内涵比这三个概念都要大。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中，一切向着符合近代社会的特点的方向的进步，笔者都视其为近代化倾向。具体说来，以下一些因素被笔者在本文中用来作为近代化过程或称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过程中的界定性因素：近代科学技术的引进和应用，商品化的增长，国际依存的加强，非农业生产——主要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在经济总量中所占比率的增加，近代机器、农具的引进和应用，城市化倾向，资本主义因素的出现和发展，经济发展中的区域化、专门化倾向等等。

中国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应该是以鸦片战争为起点的。具体到东北地区，则是在 1860 年清政府开禁之后，近代社会文明才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发展。这个发展过程在民国继续进行，但是由于精力和材料的限制，笔者无法将民国这一时段也包括在本文的研究中。基于以上几点，本文拟主要概述 1860—1911 年这一时段内的东北的移民和近代社会文明的发展的情况，并分析移民在这一时段内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所起的作用。

一. 东北开禁与移民的增加

1. 东北开禁

清初定鼎北京之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了 23 年（顺治元年至康熙七年）的鼓励移民的政策，之后转而对东北采取封禁政策。不过从顺治元年至咸丰九年（1644—1859），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无论清政府开禁还是封禁，向东北的移民从来未停止过。

从 1644 年至 1859 年的二百多年中，移民使东北发展的脚步大大加快了。人口大大增加了，耕地面积也在不断扩大。但是尽管人口、耕地面积的绝对数字增加了很多，相对于内地的其他省份来说，这一时期的东北仍是很落后的。1851 年直隶的人口是盛京的 9 倍，耕地面积是盛京的 6 倍⁴，而直隶省的面积不过比盛京稍大。1851 年全国人口数为四亿四千多万，而东北地区的人口尚不到三百万人⁵。

咸丰十年（1860 年），吉林将军景淳奏请开垦吉林乌拉、阿拉楚喀、双城堡等禁荒，容纳流民，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⁶。这是清代后期东北开禁放荒之始⁷。紧接着，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于咸丰十一年奏请仿照吉林章程，开放所属呼兰、绥化、通肯等处民荒，也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⁸。

清代后期东北的开禁，是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

³ 《中国的现代化》，（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第一版，第 4 页。

⁴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美）德·希·珀金斯著，第 274 页。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年版。

⁵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 314 页。

⁶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⁷ 在此之前清政府也曾数次在东北移民屯垦，放垦禁地，但是移民活动都是针对旗人组织的，放垦禁地则都是被迫承认已成禁地被垦的事实，并且每次放垦之后，都会重申禁令，对已放垦的禁地，则强调维持现状，不得增加移民、增垦土地。而景淳奏折被批准后，清政府除了针对一些的特殊情况以外，再未重申禁令，并且放荒的频率与规模都是之前所无法相比的。前辈东北史学者亦多以景淳奏折为清代后期东北正式开禁放荒之始。

⁸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从 1860 年到 1895 年，是东北的局部开禁时期。在这一时期，清政府对东北的开禁一直是零星的、逐块的、被动的。说它“被动”是因为基本上每块土地的开禁都是因为移民“私垦既久，驱逐不易，惟有升科而已”⁹，也就是首先由汉族移民在违法的情况下造成了垦种的事实，然后清政府才被迫加以承认。

东三省之中，盛京¹⁰的开发一直远远超过吉林和黑龙江，到 1860 年，盛京境内肥沃、平坦的土地大多已有汉族人民耕种，所余的禁荒主要是围场、牧场和东边外禁荒。盛京东边外，即东六边门（威远堡、英额、兴京、碱厂、瑗阳、凤凰）之外，到鸭绿江与图们江之间的广大地区，是清朝的“祖宗发祥之地”，一向是封禁的重点，但东边外流民禁而不能止，同治六年，“盛京将军都兴阿派员勘丈边外各地亩，于近边一带，准升科熟地五十余万亩”¹¹。这是最早开禁。东边外地区中地处滨海的大东沟，是流民聚众伐木的基地，光绪元年，清政府“派道员陈本植、知府恒泰、记名提督左宝贵等率领各委员逐地行绳，除上则之地，按亩升科外，其余中则以两亩为一亩，下则以三亩为一亩，通共折算，并将将军都（兴阿）所办升科五十余万亩之地，统计熟地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余亩有奇”¹²。由于折算的缘故，实际放出的数字比这个数字多许多。光绪三年，设东边道，驻凤凰城，至此封禁了二百余年的东边外地区基本全部开放了。同治二年，御史吴台寿建议清政府开放奉天官荒马场，以开利源，清政府飭副都统恩合查复此事，后按恩合的建议，将大凌河以东牧场全部放垦，以西牧场则封禁如故。

吉林“禁地独多”¹³，咸丰十年景淳奏折得到批准后，“乌拉、阿拉楚喀围场蜚克图站、双城堡、恒产各荒共地二十二万余垧”¹⁴先后丈放给流民垦种升科。同治二年又开放了伊巴丹、孤拉库等七处废弃围场的可垦地三万八千六百六十八垧¹⁵。同治九年，又续开围荒地二万垧¹⁶。光绪六年，吉林将军铭安奏请将“阿（拉楚喀）属围场正身大青背山一带佃民开垦碍围之地，一律清丈，给照升科”¹⁷，也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

黑龙江开禁的情况反映了这一时期清政府在开禁东北问题上的消极与犹豫。特普钦奏折于咸丰十一年得到批准后，呼兰地区弛禁放荒，至同治七年，八年间共放出毛荒二十余万垧。但不久黑龙江将军德英以“新荒续领未能踊跃，拟请暂时停放”¹⁸。此后，屡放屡停。光绪十年、十三年，清政府两次下令永远封禁黑龙江。

从咸丰十年开始开禁到光绪初年，清政府对东北开禁的态度始终是犹豫的，朝野上下对此争议不休，大量荒地还在封禁之列。

⁹ 《清代通史》，第 1663 页。

¹⁰ 今天的沈阳市在明代为沈阳卫，清天命十年迁都于此，天聪五年尊为盛京，顺治元年清朝迁都北京之后，以盛京（即今沈阳市）为留都。顺治十四年移原辽阳府于盛京，改为奉天府；乾隆初设盛京将军，驻盛京城，辖地相当于今辽宁省（光绪三十三年改为奉天省）。因有盛京将军和奉天府尹同城叠置，故乾隆以后往往以奉天和盛京混称盛京城，再后来更有以盛京和奉天混称该省省名的情况。但是在清代顺治以后却没有以沈阳称呼盛京城的情况，盛京城改称沈阳是在民国初年。现在的许多历史著作在提到清末的奉天（城）时，往往称其为沈阳，这是错误的。又：此处的盛京指的是盛京将军辖区。

¹¹ 《清代通史》，第 1657 页。

¹² 《清代通史》，第 1657 页。

¹³ 《清代通史》，第 1681 页。

¹⁴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¹⁵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¹⁶ 《大清会典事例》卷 167。

¹⁷ 《吉林通志》卷 29。

¹⁸ 《清代黑龙江历史档案选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33 页。

1895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之后，东北面临着空前的被侵夺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再也不能在开禁东北的问题上犹豫了。1895年以后，清政府虽未正式发布过废止封禁东北的上谕，但是它通过一系列放荒济用、招民实边的行动，宣告了东北封禁政策的全面破产，从而使东北地区进入了全面开禁的新时期，开始了移民和开发的新阶段。

盛京放荒：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开始办理海龙、东西流水等围场和养息牧、大凌河牧场放荒开始，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止，盛京（1907年后为奉天省）先后16次放荒，丈放围场、牧场等荒地1078万余亩，丈放蒙荒¹⁹1839000垧（合1893万亩），总计放荒2917万亩，征收荒价银800余万两²⁰。

吉林放荒：光绪二十一年以后丈放的荒地有1593万余亩²¹。

黑龙江放荒：1895—1911年放荒6917万余亩²²。

1895年—1911年17年的时间里，东三省放荒的面积比1860—1895年的30年的时间里大大地增加了。吉林增加的数字最少，也在四倍以上；盛京增加了十倍以上；黑龙江最多，增加了三十余倍。

2. 这一时期的东北移民

(1) 移民的增加

东北开禁是移民不懈斗争的结果，开禁又大大加快了东北移民的脚步。

表 1²³

人 口 省 别	年 限	1851年	1911年
奉天		2, 582, 000人	11, 018, 517人
吉林		327, 000人	5, 538, 405人
黑龙江		200, 000人	1, 858, 792人
总计		3, 109, 000人	18, 415, 174人

¹⁹ 蒙古哲里木盟十旗在清代分属东北三将军辖区，各旗被封禁的荒地，称为“蒙荒”。

²⁰ 《清代东北史》，第445页。

²¹ 《清代东北史》，第446页。

²² 《清代东北史》，第446页。

²³ 据《清代东北史》第450页及《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274页所载数据编制。

从表 2 来看, 60 年间, 东北地区的人口增长了 5 倍,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 83.3%。吉林、黑龙江的人口增长尤其迅速, 60 年内分别增长了 15 倍和 8 倍。1851 年以后, 由于战乱、灾荒、贫困等原因, 中国的人口总数长期徘徊在四亿左右, 增长率基本为零, 而东北地区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却如此迅速, 这显然是大规模移民的结果。当然东北地区在这一时期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应该要高于国内其它地区, 但是自然的人口增长绝不可能在六十年的时间里给一个地区带来数倍的人口增长。我们可以假定这一时期东北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为 4.9%, 那么以 1851 年的东北人口作为基数, 按这个增长率, 到了 1911 年东北的人口总数因该是 4, 023, 046 人, 这个数字比 1911 年东北的实际人口少了 78%。4.9% 是 1819—1851 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²⁴, 这是个相当高的增长率, 应该不会比东北的实际的自然人口增长率低。(东北地区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以后连续遭受了甲午战争、沙俄入侵、日俄战争等战乱, 这些战乱对东北的自然人口增长率应该有很大的负面影响。) 所以可以比较肯定地说, 清末东北居民中至少有 78% 以上是 1851 年以后来到东北的移民。

其实, 以上的估计还只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估计, 还有两个因素没有被计算在内: 一是东北的自然人口增长中也包含有移民的因素, 即自然的人口增殖中有一部分是来自于移民的生育繁衍。二是临时性的移民未被包括在表 2 的人口数字中。临时性移民, 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流动人口, 他们在东北停留的时间或长或短, 但是最后都不会在东北入籍、定居, 而是要返回家乡。由于资料缺乏, 笔者无法统计出这种移民的确切数字和其在东北移民中所占的比例。但是由于往返东北的交通还不象民国以后那样便捷, 因此这一时期临时性的移民在东北移民中所占的比例比民国以后应该要小得多。不过这种临时性移民多为青壮年男性, 在生产中所起的作用很大, 在某些行业, 如采矿、筑路等行业所雇用的劳力中, 这种移民甚至占了绝对多数。在这一时期的东北地区的人口构成中, 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的存在。临时性移民是东北地区贯穿于近现代史的一个重要现象, 他们在建设和开发东北中的作用是不容被忽视的。

(2) 移民的来源、构成、地域分布和职业分布

开禁之后的东北移民, 与以前一样, 主要来自山东、直隶、山西、河南四省; 其中山东、直隶两省移民最多; 两省移民之中, 又以山东移民为主。“诚就三省住民一一考询其原籍, 似有十分之八九为山东”²⁵。山东移民占东北移民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左右, 直隶移民占百分之七、八, 其余为山西、河南及它省移民。

山东移民如此之多, 其主要原因在于山东的人口压力和灾害问题。清代后期山东人多地狭的矛盾极为突出。1851 年山东省人口为 23, 266, 000 人, 比直隶、河南、山西的人口都要多出一千万以上²⁶。而山东的耕地面积却和直隶、河南相差无几(1873 年山东耕地面积为 127 万市亩, 直隶为 120 万市亩, 河南 125 万市亩²⁷)。这一时期山东的自然灾害也很严重。比如 1901—1904 年, 黄河连续四年, 年年在山东决口; 1905—1909 年山东没有一年没有水灾, 水灾之外, 还间有旱、蝗灾; 1910 年黄河在山东寿张决口, 加上夏初干旱, 后又阴雨连绵, 使山东受灾面积达 90 州县。²⁸十年间山东竟然无一年没有天灾。加以战事连绵, 盗贼蜂起。在如此的人口压力与天灾人祸的交乘袭击之下, 山东的贫苦农民大量破产逃亡。清末山

²⁴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第 274 页。

²⁵ 《清代通史》, 第 1704 页。

²⁶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第 274 页。

²⁷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 第 316 页。

²⁸ 李文海:《清末灾荒与辛亥革命》,《历史研究》1991 年第 5 期。

东往往“数十里不见树木人烟”，有的村庄出亡人口占一半以上，甚至一村人全部走光，其去向主要是东北。²⁹ 此外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对，最近处海上直线距离还不到 300 华里。取道水路由山东前往东北很便捷。

从身份构成上来看，各省移往东北的移民，几乎全部都是贫苦的农民。

1866 年以前，清政府禁止汉族妇女进入东北，1866 年后取消了这项禁令，但在东北移民的性别构成中，男女比例仍严重失调，男性远远多于女性，只身而来的移民远远超过了举家前来的移民。这是因为持传统观念的中国农民不到实在是走投无路的时候，决不会举家背井离乡；若为了生计，家庭中必须有人外出，那么这个任务一般是由男子来承担的。此外男子要比女性更加适合艰苦的移民生活，在艰苦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女性要生存下来都很困难，男性却可以进行生产活动。而且清末东北对劳动力需要最多的各种产业如开荒、伐木、筑路、采矿等所需要的也主要或只是男性。最后，对移民来说，单身移民要比举家移民更容易生存，单身男性移民更容易找到生计，养活自己，但如果加上家眷的拖累，生计就会艰难许多。据编纂于民国初年的《安图县志》记载，民初安图人口中男性为 14, 349 人，女性仅为 8, 301 人。另据同时期编纂的《铁岭县志》和《辉南县志》，铁岭县民初人口中男性 157, 972 人，女性 126, 977 人；辉南民初人口中男性 51, 741 人，女性 31, 346 人；男性均远远多于女性。这些显然都是移民中男女比例失调的结果。

从年龄构成上看，东北移民以青壮年为主。据清末民初的调查，东北移民中少年占 41.4%，壮年占 54.7%，老年占 4.4%。³⁰这当然也是由于移民生活的性质所决定的。东北移民几乎全为讨生活而来，而当时东北所能提供给移民的工作，又绝大多数是垦荒、采矿等极为艰苦的重体力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青壮年移民更适合生存下去。

东北移民多为青壮年男性，这为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设提供了劳动力。

移民到达东北之后，他们的分布，由南而北，奉天（盛京）最多，吉林其次，黑龙江最少。但是吉林、黑龙江的移民增加很快，在增长率上远远超过了奉天（参见表 2）。尤其是黑龙江，1907—1911 年 3 年间移民平均每年增加 10 万以上，渐有取代奉天成为移民的主要去向之势。三省内部，在清末也有由南向北移民之势，即由奉天向吉、黑两省移民。这是因为当时奉天的开发已远远超过了黑龙江和吉林，吉林，尤其是黑龙江相对奉天来说，更加地广人稀，机会更多。

这一时期的移民到达东北之后，最多的是从事农业。移民中也有许多人在各地的农村和城镇里从事各种手工业。在营口、奉天、大连等大城市，则有许多移民从事力役和服务业。此外移民还是东北洋务工业和其它近代工业、产业的主要劳动力来源。人数众多的移民大军，为东北的各行各业提供了最廉价的劳动力来源，东北的各行业均从中补充廉价劳动力。

二. 移民与 1860—1911 年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

1860—1911 年这段时间是清代东北移民运动的高潮期，下面我们将从最重要的，同时也是与移民关系最为密切的几个方面来概述一下这一时期中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情况，并分析移民在这几个方面所起的作用。

²⁹ 王海波：《东北移民问题》，中华书局民国 24 年版，第 18、19 页。

³⁰ 《东北移民问题》，第 54 页。

1. 移民与东北农业的进步

大量移民涌入东北，使东北的农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首先，移民的到来使得对粮食的需求大增，同时移民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大量劳力，于是第一个明显的结果就是东北的耕地面积成倍增长。1873年吉林耕地面积200万亩，到1911年达到33,121,450亩，38年增加了15倍³¹。1911年东北耕地面积总数达到10,266万亩以上，是1840年的耕地面积总数2,864万亩的3.58倍³²。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粮食的产量也不断增加。

其次，移民带来了内地较为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提高了东北的农业生产水平。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清代后期进步极为迅速。在道光以前，东北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仍属于典型的粗放经营；道光以后，这种情况就有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民初，在稻谷、小麦、玉米、薯类、大麦、高粱、谷子等一些主要粮食作物的单产量上，奉天省的水平相当或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字，吉林省和黑龙江省的水平相当或略低于全国平均数字，这其中除了有劳动力投入增加的原因之外，当然也有技术进步的原因。

在传统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清代末期，东北农业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趋势，体现出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化农业过渡的趋势。

首先，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清代末期东北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大豆是清代末期东北农业生产商品化的典型。大豆是东北最大宗的经济作物，也是东北最大宗的出口农产品，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的需求量都很大。东北的大豆外销量在整个清代后期一直呈迅速增长的趋势，据《满洲评论》20卷第2号所统计的数字，经营口港输出的大豆和豆制品（包括国内和国外市场），1895—1901年间的年平均额比1872—1881年间的年平均额增长了2.8倍。出口国外的大豆的增长尤其迅速，据《满洲事情》第2辑的统计，1909年输往欧洲的大豆比1908年增长了10倍。清末东北本地的榨油业发展也很快，豆油、豆粕等豆制品的产量增加得很快。巨大的产品市场和产品的高度商业化刺激了东北的大豆种植，1910年种植大豆的耕地占东北耕地总面积的20%，年产量高达19,991,000吨³³。中国大豆的出口量在清末已居世界首位，而其中东北大豆的出口占全国总数的90%以上³⁴。东北的大豆生产，在清末已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商品原料作物生产。

除了大豆之外，清代末期东北其它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也有了很大的提高。1911年吉林、黑龙江两省的粮食总产量为1,015,560多万斤，扣除种子、食用、酿酒、榨油、牲畜饲料用粮769,860万斤，剩下的都是供市场交换之用，占粮食总量的22.5%³⁵。奉天省辽阳县1910年有耕地230万亩，当年输出大豆20万石，高粱15万石，杂粮10万石，还有用大豆、高粱加工制作的豆油300万斤，豆粕77万枚，烧酒200万斤³⁶。1909年东北北部新垦区小麦输出率为80%，大豆输出率为70%。³⁷

³¹ 《清代东北史》，第448页。

³² 《清代东北史》，第448页。

³³ 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第230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³⁴ 《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第230页。

³⁵ 《清代东北史》，第452页。

³⁶ 以上为《辽阳县志》的统计数字，转引自《清代东北史》第453页。

³⁷ 《北满洲经济调查资料》，第55—57页，转引自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1期。

高度商品化是近代化农业的特点。东北地区的农业生产在清末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商品化趋势，尽管商品化的程度离真正的近代化农业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是一种先进的趋势。

这一时期东北的农业生产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化和区域化的倾向。“清末东北出现了“南豆北麦”的格局，辽河流域的大豆和松花江中下游地区的小麦皆已成为当地居于优势的作物。”³⁸此外奉天南部山区的柞蚕业在清末业已经也颇具规模。“南豆北麦”格局的形成，主要是受市场需要的影响，清代东北大豆主要由营口输出，因此距营口港较近，经济上受其辐射较强的辽河流域就成为了大豆的主要产区；而东北的小麦在清代主要是向俄国出口，北部地区种植小麦向俄国出口比南部要近便得多。奉天南部山区柞蚕业的繁荣，则主要是因为当地多柞树，自然环境比较适合养蚕。

在农业生产进步的基础上，清末东北的农业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经营方式，其突出的表现是一批新式的农牧垦殖公司的出现。这些垦殖公司有商办的、官办的，也有官商合办的。它们雇佣农业工人，使用农业机器，多实行股份制，具有一些近代化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特点。

清末东北兴办的农牧垦殖公司主要有：

兴东垦务公司，广东资本家陈国圻于 1907 年集资在黑龙江省汤原县兴办。该公司采用了先进的农业技术，购置了火犁、收割机等农机设备。公司还购置面粉加工机器，建立面粉厂，将所产粮食就地加工，并兼营畜牧业。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对兴东垦务公司给予了很高的评价。³⁹

瑞丰农务公司。为了振兴垦业，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一手操办，于 1907 年成立了官商合办的瑞丰农务公司，承领官荒 2 井（每井合地 16.2 万亩）购进火犁两具。⁴⁰

长岭县天利公司，属官商合办性质。额定资本为吉平银 10 万两，吉林地方官府出一半，另一半由众商集股。公司承领放剩瘠荒 8 万余垧，以“野无旷土，开辟利源”为经营宗旨，在适于耕作的荒地上筑庐凿井，种植五谷，在沙岗地栽植各种树木，养草茂盛的盐碱地则引为牧场，是一个进行多种经营和综合开发的经济实体。⁴¹

到 1912 年，奉天省已有农牧垦殖公司 12 家，已缴资本 324, 375 元。其中包括股份公司一个，有公积金 9, 150 元；股份有限公司 7 家，有公积金 3, 085 元；合资有限公司 3 家，有公积金 2, 865 元；其余一家不详。吉林省到 1912 年有农垦公司 8 家，已缴资本 630, 995 元。⁴²

这些农垦公司，是东北历史上的新事物，是东北农业中的新生的近代化因素。

清末东北地方政府为了振兴地方经济，提倡并引进传播近代农技。为此，东北各地方政府除了提倡和扶植私人创办农牧垦殖公司，并直接出官款设立农牧公司外，另一方面还以官款设立农业试验场，引进和研究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奉天省农业试验场是清末东北官方设立的最大的农业试验场，1906 年始设于奉天（城）大东门外，选用官地一千亩，分设苗圃、

³⁸ 衣保中、吴祖鲲《论东北农业近代化》，《社会科学战线》1997 年 1 期。

³⁹ 衣保中：《中国东北农业史》，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56 页。

⁴⁰ 徐世昌：《东三省政略》，卷 11，《实业·黑龙江省》。

⁴¹ 《中国东北农业史》，第 357 页。

⁴² （本段）以上各数字均引自《中国东北农业史》第 358 页。

农产、园艺、畜牧、蚕丝五区。试验场从全国各地和外国选用并试验农作物新品种，仅在 1907—1908 年就试种了 185 种外国农作物新品种。试验场曾运用西法对当地的各类土壤进行了化学分析，还对磷酸质肥料的性能及外国新式耕作法进行了实验。试验场还引进和试用了许多外国新式农具。⁴³各官办农业试验场对清末近代农技、农具在东北地区的应用和推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体现了清末东北地方政府在农业方面的一些近代化意识。在清末的最后几年里，各个地方都有官吏都表现出了一些近代化意识，并且表现在施政的各个方面，东北地区也不例外。

移民的增加促进了东北传统农业在清代最后五十年中的进步，随着传统农业的进步，清末东北农业中又出现了新的少许的近代化的趋势。尽管只是不起眼的少许趋势，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中国的近代化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的、缓进的过程，因此这种发生在基础层面上的并不醒目的变化，却正是近代化进程中所非常需要的，对于建构近代社会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特别是清代的东北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因此农业中的近代化趋势，对于整个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来说就更显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过，在这个时期的东北的农业的近代化趋向中，移民的作用从总体上来说是有限的。农业生产中的区域化和专业化倾向如前所述主要是因为市场和自然环境的原因。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的直接原因是粮食产量的增加，而粮食产量增加又主要是因为移民的增加，因此在这一点上移民是主要的原因和直接的动力。但是新式农牧垦殖公司和农业试验场相比之下最能体现出近代化的特点，而它们是绅商、官府创建并引导发展的。更重要的是，绅商和官府的这些行为是主动的、有意识的，因此是有意识的近代化行为。而移民虽然直接推动了东北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却并非有意为之。所以，在 1860—1911 年这段时间里，移民尽管直接推动了东北农业生产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却并非东北农业近代化趋势中的主导力量。也不能仅凭对农业生产商品化的推动就说移民是这段时间中东北农业近代化趋势的主要动力。

不过，上述 1860—1911 年间东北农业的进步，是这一时期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2. 移民与近代工业的发展

(1) 近代工业的兴起

1877 年李鸿章试筑京奉铁路，是东北洋务运动的开始，也是东北近代工业的开始。东北洋务工业的重点是军火工业，1883 年建成的吉林机器制造局耗银 28 万两，生产新式枪炮弹药，产品主要供应吉林、黑龙江两省的练军，是清代东北最大的军火工厂⁴⁴。军火工业之外，洋务派在东北所办的矿业规模也很大。黑龙江漠河金矿由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衙门共同垫支官款白银 13 万两，于 1888 年设局开采，是东北官办矿业中规模最大的。李鸿章委任吉林候补道台李金镛为金矿会办。李金镛招流民数千为矿工并募练护矿防勇一营，不但开矿，而且屯种、招商，使得漠河金矿屯牧并兴，兵民商贾辐辏，很快发展成为边陲重镇。漠河金矿至 1890 年产金即达 62,000 两，还清了公私积金，提存了余利，还解充了黑龙江的军饷。但是总的说来，东北洋务工业与内地一样，重军工，轻民生，弊端很多，发展不快。

清末东北的外资工业和民族工业发展很快。东北的外资和华资企业均兴起于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列强凭《马关条约》可在东北投资设厂，华商设厂的限制也被清政府取消了。在这

⁴³ 《中国东北农业史》，第 331 页。

⁴⁴ 张万鑫：《洋务派创办的吉林机器制造局》，《南开史学》1986 年第 1 期。

种情况下，东北的外资和华资企业的发展都很迅速。清末东北新式工业中有几个行业的发展特别显著。机器面粉厂 1900 年开始在东北出现，到 1911 年已有 11 家，资本总计 1, 505, 000 元，占当时全国机器面粉厂总资本的 22.4%⁴⁵，东北成为当时全国的两大面粉工业基地之一。东北地区盛产大豆，榨油业很早就已兴起，清末更迅速发展，在传统手工业作坊的基础上发展起了新式机器油坊。新式机器油坊首先兴起于营口，最初采用以蒸汽力将黄豆压碎，用手推螺旋式铁榨榨油的方法，后来则采用机器水压法。到 1911 年，在营口，华商开办的新式机器油坊达到了 14 家，各厂资本均在炉银（营口炉银）万两以上，雇用工人计一千余人⁴⁶。1907—1911 年，大连的华商又相继开办新式机器油坊 8 家⁴⁷。当时全国新式机器油坊总计 42 家，而东北就有新式机器油坊 24 家，占一半以上⁴⁸。东北纺织工业的发展，以奉天为中心。1907—1911 年，仅奉天（城）与辽阳两地就新建了 5 家新式机器纺织工厂，资本总计 109.1 万元，织机 315 台⁴⁹。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清朝末年，东北的近代工业形成了军火、采矿、面粉、榨油、纺织五大支柱产业。这五大行业，当时在全国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根据《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等不完全统计，东北地区到 1911 年为止，资本在万元以上，部分或全部使用动力机器生产的厂矿企业，总计有 70 家”⁵⁰。这集中反映了清末东北近代新式工业的发展水平，比上海、天津等发达地区虽有不如，但是和当时国内其他一般的地区相比，已经毫不落后了。

(2) 移民与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

近代工业的发展，是东北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标志。在清代前期和中期，东北荒凉落后，农业尚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更谈不上有什么近代工业。随着移民对东北的开发，东北的农业有了长足的进步，提供了一定的发展近代工业的基础。因此，东北近代工业的兴起，首先是建立在移民所带来的农业进步的基础之上的。

东北近代工业的兴起，是在 1860 年以后。这段时间，正是清代东北移民的高潮期，大量涌入的移民，对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最主要的就是移民为东北的近代工业提供了工价低廉的劳动大军。移民如潮般涌进的清末东北，到处聚集着大量的待业移民，迫切需要首先解决生存问题，其劳力之丰富与工价之低廉都是国内所少有的。这些构成了在东北开办企业的极为有利的条件，对私营企业的吸引力尤其大。东北本非棉花产地，纺织工业却成为了它的五大工业之一，这其中不能不说有劳力资源和工价对企业主的吸引力的因素。

不过，移民对东北近代工业的作用，主要的也只是体现在提供劳动力这一方面。移民并不是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东北的近代工业由洋务派开创，以后的发展，也主要是由洋务派、外国资方和民族资本家来主导。

移民也不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移民固然是为东北近代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和对资方有吸引力的工价，但这只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中的有利因素，并非决定性的因素。早期洋务派在东北所开办的企业基本上没有或很少考虑这种因素。外资在清末东北的近代工业中占很大的比例，但是外资在东北开办企业时，考虑的因素很多，包括政治、地理、

⁴⁵ 《清代东北史》，第 470 页。

⁴⁶ 《清代东北史》，第 470、471、472、463 页。

⁴⁷ 《清代东北史》，第 470 页。

⁴⁸ 《清代东北史》，第 471 页。

⁴⁹ 《清代东北史》，第 463 页。

⁵⁰ 《清代东北史》，第 463 页。

原料等因素，而其中政治的因素往往是最首要的因素，因为清末东北的外国资本的工业企业主要是日本和沙俄的企业，这两个国家当时对东北都有政治方面的重大图谋，因此非常鼓励本国资本到东北开设企业，并且还直接由国家政府出面在东北开办企业，经营项目。比如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就是由日本政府出面组织成立的；而中东铁路则是由沙俄政府出面和清政府签订章程和合同，然后成立东省铁路公司修筑、经营的。这样的企业和项目，在开办时是不会首先考虑移民之类的因素的。对于私营企业来说，移民所带来的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工价低廉的因素是很有吸引力的，属于这些企业在开办时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但是也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清代后期各地的劳动力资源都比较丰富，近代工商企业在开办时一般在雇佣工人方面不会遇到太大的困难。工价的差异对于资本相对较小的私营企业来说虽然是很重要的因素，但也不至于绝对化，还是要和其它因素一起综合考虑。私营企业在开办之时一般是要综合考虑建设厂房和购买机器的成本、原料、交通、销售、雇工、工价等因素。不过尽管如此，也不能抹煞移民对于东北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的作用。若没有移民改变东北的荒凉局面，若东北仍然像过去那样缺乏人口和劳动力，开办工厂和企业就根本无从谈起。此外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工价毕竟仍然是在东北近代工业的发展中起作用的影响因素之一。

我们说移民不是东北近代工业发展中的主导力量，还因为移民都是下层的贫苦民众，一般只能进入工业企业作工人、店员之类的低级工作，很少有担任高级职位或自己开办工厂的。当然在工业企业的开办者、经理、董事之中不乏外地人，但是这些外地人中有许多很难被看作为是移民。他们手中有资金，看中了东北，来这里开办企业，谋取利润。他们与下层的移民不同，来去很自如，家也不一定随同本人搬来东北。有的人在家乡或是别的地方还有其它的产业。如果把这样的人也看为移民，那么周学熙在天津开厂，徐润在上海开厂就都都要算作是移民办厂了。所以，只有自己是移民，在东北当地起家办厂，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把他算作是东北的移民实业家。再宽泛一些，东北移民的第一代后裔在东北开厂，也可以看作是移民办厂。这样的移民实业家，与在东北开办近代工业企业的洋务派、外国资方以及其他的民族资本家相比较起来，在人数上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其资本所占的比例就更小了。

3. 移民与东北城市的发展

清代前、中期，东北地区已经兴起了一批城市。其中盛京有奉天、辽阳、开原、兴京、铁岭、抚顺、牛庄、凤凰、熊岳、岫岩、金州、复州、盖州、广宁、宁远、锦州、义洲等；吉林有吉林、宁古塔、三姓、伯都讷、阿勒楚喀、拉林、双城堡、珲春等；黑龙江有齐齐哈尔、瑗琿、墨尔根、呼兰、海拉尔、布特哈等。这些城市，就其形成来看可以分成三种类型：“一是移民后在原有军事堡垒和政治中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一是移民后在移民所形成的聚居点基础上发展起来；一是由于经济活动频繁而自发地形成。”⁵¹实际上第三种城市的人口来源也主要是移民。

1860年以后，移民继续在东北的城市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移民为城市提供人口，但是决定城市的分布和发展的主要因素，却已经不是移民了。

1860年以后，东北发展最快，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首先是营口。营口本是盛京沿海的一个小渔港，1858年被《天津条约》规定为开放港口。此后，营口作为东北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港口，迅速地发展起来，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东北地区的商业、金融中心。由于营口是东北大豆和其它农产品的主要输出港，因此带动了辽河航运业蓬勃兴起，并由此推动了整个辽河流域的一大批中小城市的发展。这些城市，原来多是农村小集镇，随着农产品集散功

⁵¹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毕业论文《清代东北移民与社会变迁 1644—1911》，作者张士尊，第 393 页。

能的加强吸引了移民大量涌入而迅速发展。如奉天的新民，原来是一个农村集镇，嘉庆 18 年设厅，光绪二十八年改设新民府，到清末，城市人口达到了 5 万余人，工场、商店分 37 行，计 1313 家，资金约计 116 万余两，从事工商业者万余人⁵²。又如辽源，在道光年间还只是一个不大的蒙古部落居地，是东蒙地区的牛马贸易集市，只有 30 余家商店，经过 40 多年以后，就发展成为居民 16, 000 余人，工场、商店 536 家的城市了⁵³。

到了清末，东北的铁路建设开始后，铁路又上升为对东北城市发展影响最大的因素。随着中东、南满、京奉等铁路的修建，在铁路沿线很快就兴起了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海拉尔、长春等城市。其中哈尔滨和长春发展最快。沙俄在建设中东铁路时，以哈尔滨为中心点，在哈尔滨设立了铁路工程局，从哈尔滨向绥芬河和满洲里方向同时开工。从此哈尔滨迅速兴起，它的早期居民以俄侨和中国铁路工人为主，到清末时已有居民 6 万多人。各国纷纷在此开设领事馆，开办银行。哈尔滨工商业繁荣，市面兴盛，有“小巴黎”之称，成为了东北北部的金融、商业和交通中心。长春在南满铁路通车后迅速发展，很快就取代了吉林，成为吉林省的中心城市。

大连本来是个名为青泥洼的小渔村。它先是于 1898 年被沙俄“租借”，日俄战争后又被日本侵占，日本政府在这里设立了“关东州”进行殖民统治。南满铁路通车后，它很快就取代营口，成为东北的最主要的海港。

奉天从清初起就一直是东北地区最大的城市，在南满、京奉铁路相继通车后也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人口至清末超过了 20 万，仍然是东北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和重要的商业城市。

根据 1909 年出版的《满洲评论》第 20 卷第 15 号，1911 年编的《东三省政略》以及《满洲地方志》、《满洲事情》第 5 辑等书的调查统计，清末东北万人以上的城市共计有 50 座，其中 20 万人以上的城市 1 座，5 至 10 万人的城市 4 座，3 至 5 万人的城市 9 座，1 至 2 万人的城市 36 座。这 50 座城市中，1860 年前已有的老城市有 22 座，占 44%；其余的 28 座城市，都是在 1860—1911 年间兴起的新城市，占 56%。这 50 座城市中有 33 座在奉天省，占 66%；17 座在吉林、黑龙江，占 34%。在这 50 座城市以外，还有许多人口在 4 千至 1 万之间的城镇，包括瑗瑯、复州、熊岳、墨尔根等，也在不断的发展之中。⁵⁴

在 1860—1911 年这一段时期中，营口的发展与开埠有很大的关系，而在哈尔滨、大连等少数几个城市的发展中，俄、日的建设则起了很大的作用。不过总的来看，在这一时期中，影响东北地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三个最主要的因素是移民、经济活动和交通。

移民对这一时期的东北城市的发展的影响是明显的。在整个清代，东北城市在 1860—1911 年间发展得最为迅速，这与清代东北移民的发展过程是一致的。城市和城市人口的分布，奉天最多，吉林和黑龙江次之，这也与移民在东北地区的分布情况一致。移民是这一时期中城市人口的主要来源，即使是主要是受交通和经济活动因素影响而形成和发展的城市，其人口来源也主要是移民。比如大连和营口就都大量吸收山东移民为城市人口。1914 年大连华籍居民有 10 余万人，其中 95% 以上籍贯为山东⁵⁵。

⁵² 《清代东北史》，第 436 页。

⁵³ 《清代东北史》，第 437 页。

⁵⁴ 本段所引用的各种调查和统计数据均转引自《清代东北史》。

⁵⁵ 《东北移民问题》，第 54 页。

但是同样也很明显的是：在这一时期影响东北的城市的形成和发展的三个主要因素中，影响最大的因素并非移民，而是交通。营口率先取得了最大的发展，是因为开埠，也是因为它是港口。大连的发展也得益于它是港口的天然优势。尤其是铁路建设开始之后，铁路又成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的决定因素。在这一时期中，港口城市和铁路沿线城市的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其它城市，从而使东北地区在清末形成了以沿海和沿铁路线为主的新的城市分布格局。交通因素决定了城市的分布格局，同时也决定了城市移民流向的格局和经济活动中心的分布。因此在交通、移民、经济活动三个因素中，是交通因素在对这一时期的东北城市的发展起主导作用。

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中东和南满铁路。沙俄从自己的战略目的出发，在建设这两条铁路时都是尽量取直线，并未特意考虑去连接既有的城市，结果是黑龙江和吉林原有的主要城市几乎都不在这两条铁路线上。这两条铁路通车后，铁路线上新兴起的城市迅速发展，取代了原有的城市的地位（如前述长春之取代吉林）。

在这一时期的城市的近代化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也不是移民。奉天、大连、哈尔滨、营口是清末东北近代化程度最高的几个大城市，这些城市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各种先进的西方近代物质文明，同时也是东北地区的文化和教育中心，清末东北新建的新式学堂和报馆等新式文化机构集中于此。这些城市，是传播近代文明的窗口，它们由近及远地带动着各自周围的地区，领导着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设的潮流。有的学者将营口、大连、奉天和辽南地区与上海和长江口地区等其它五个地区并列为清末中国六个以口岸城市为中心的近代文明较为发达的地区⁵⁶。但是这些城市的较高的近代化程度，却主要是得益于它们的开埠和通火车等交通方面的便利条件，交通的优势使得这些城市比其它城市更方便沟通外界，获取信息，因此可以得风气之先；交通的优势也使得洋务派和中外资本家多选择在这些城市里开办企业。此外这些城市的近代化程度较高也是得益于居住于这些城市之中的开明官绅、知识分子和外籍人士的带动和引导，他们是东北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的主导力量。移民对于城市的近代化，仍然只是起到了提供人口基础的作用，既没有成为东北城市近代化的主导力量，也不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要动力。

三. 总评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 1860—1911 年这一段时期中，在东北的农业的近代化趋势、近代工业的发展以及城市的发展和近代化这三个方面，移民均不是主导力量，也不是主要的动力。以上三个方面均属于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最重要的物质要素。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东北移民几乎全都是贫苦的农民，在建设近代文化方面他们不可能起到主导作用，也不可能是主要的动力。所以笔者以为以上的分析虽并不全面，但已经大致能够说明在东北这一时期的全部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移民不是主导力量，也不是主要动力。

移民未能成为这一时期东北近代社会文明建构的主导力量和主要动力，是由近代社会文明的特点和这一时期的东北移民的特点所决定的。近代社会文明不同于我国的传统文明，它产生于西方，以西方的近代工业文明、科技、思想文化、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为核心内容。要在中国建设这样的文明，首先必须得接受和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制度和思想文化。在中国建设和发展近代社会文明所需要的主导力量的成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一个或是数

⁵⁶ 陈振江：《简明中国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增订本），第 390 页。

个：有比较高的文化水平，比较新的知识结构，比较先进的思想，比较高等的或者是比较新式的职业，比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一定的权势，比较好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具有以上一个或数个条件的人，才有可能学习近代社会文明的知识或较主动地实践建设近代社会文明的行为。而如前所述，这一时期的移民的实际情况却基本上都和上述要求正好相反。⁵⁷移民几乎都是来自农村的贫苦农民，他们所熟悉的小农经济和他们的思想意识与近代的生产方式和思想意识想去极远，他们受教育的程度都很低，他们的生活又长期处于谋生的最低水平，这些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有机会去主动学习和接受近代知识，也不可能有意地、主动地去实践建设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行为。因此它们不可能成为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主导力量。他们一直是而且也只能是被动地由其他力量领导着建设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移民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都仍处于传统的范围之内，而近代社会文明却与中国传统文明大相径庭，当移民的生产、生活和价值取向还都完全处于传统的范围之内的时候，他们未能成为发展方向完全不同于传统文明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的主要动力当然也是很自然的事了。

但这并不是说移民在建构东北近代文明的过程中不起作用，实际上，在 1860—1911 年期间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过程中，移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为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基础。首先，清政府开禁东北以后，移民大量涌入，增加了东北的人口，这为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提供了人口基础。其次，移民的涌入极大地推动了东北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进步是这一时期东北其它各项事业发展的基础和重要动力。最后，在建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过程中，移民在工商业等其它各个方面也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也主要体现在为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人口和劳动力的基础。

移民还给东北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带来了独特的特点。那就是可塑性极强。与同一时期中国其他地区的近代化过程比较起来，东北地区的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具有强得多的可塑性。这是由于东北的移民社会的特点造成的。首先，由于东北在这一时期在地理空间、产业空间上都存在着大量的空白可供建设，而源源不断的移民又使得所有的建设都没有劳动力方面的后顾之忧。这样就使得各种力量可以在东北大展身手，按着他们的设想在东北进行各种建设，按着他们的意愿去塑造东北。其次，这一时期东北的人口构成中移民占了最大的比例，而东北移民几乎全都是贫苦农民，受教育少，文化层次低。尤其是在安土重迁的传统中国农村，农民一旦敢于离开故土，远走他乡去谋生，大都会变得富于开创精神，较少保守观念。这些特点使得他们受传统文化的束缚比较少，容易接受新事物，在思想观念上比较容易被塑造和重塑。由于是远离故土来东北谋生，因此移民对于职业和生活的要求都很低，基本上都是能生存就行，因此在职业和生活上，他们也是比较容易被塑造和重塑的。对于一个以这样的移民构成人口主体的社会，近代社会文明建构的主导力量可以非常容易地按着自己的设想去塑造或重塑这个社会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职业构成，而这些又会很容易地影响和重塑这一地区的风俗习惯、地域文化和居民的性格。最后，由于我们上面所说的移民的特点，他们自己也总能够较快适应新环境、新情况，对在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出现的各种新

⁵⁷ 从清初开始，在东北地区就一直存在着移民生产团体。移民们组织起来，以团体的形式在深山老林中从事伐木、采参等生产。这是移民们在恶劣的生产环境及官方的封禁政策下，为了生存、自我保护和提高生产效率而采用的一种生产方式。鸦片战争以后，黄金价值提高，东北大批移民转向采金，采金业中出现了许多移民生产团体，其中最著名的是“韩边外”团体。移民生产团体在清代后期在东北大量存在。以“韩边外”团体为代表的这些东北移民生产团体，大都以某一业为主，兼事多种经营，自给性很强。在管理上它们大都采用把头制。各团体的社会生活都很封闭，“韩边外”集团甚至在团体内部私设审讯机构，并购买枪炮，组成了一支上千人的武装，实际上成为地方割据势力。“韩边外”团体后来被清政府招抚改编。许多移民团体逐渐发展成为村落。这些纯粹由移民组成的生产团体，在管理、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都没能表现出近代化的倾向。参见《韩边外》，李澍田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7 年版。

事物、新局面，多能迅速适应并找到主动融入的办法。以上几点使得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呈现出极强的可塑性。在这一时期的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近代化所遇到的阻力比在国内其它地区所遇到的阻力都要小得多，以铁路的建设为例，铁路在东北开始建设后就一直没有遇到过内地初建铁路时所遇到的巨大阻力。面对着移民社会这样的一个社会基础，近代化事业的主导力量总是能够比较容易地把东北按着他们的设想来塑造或重塑。在这一时期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具有近代意识的官绅努力想把东北建成新式农业基地并初见成效；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将东北建成了榨油工业基地和纺织工业基地；随着近代交通的发展，东北的城市分布格局迅速地由原来的传统格局转变为以沿海和沿铁路线分布为主；俄国努力使哈尔滨俄国化，日本在旅大建设“关东州”，竟也都部分地达到了目的。事实上，从东北社会成为一个移民社会开始，东北的社会文明就始终具有强大的可塑性，这种可塑性强的特点随着东北移民过程的持续一直保存着。在民国以后，东北也是被各种势力比较容易地按着自己的意愿先后塑造成了民族工业基地、粮仓、重工业基地等等。各种势力的历史存在也在东北的方言、生活习惯、地域文化等各个人文方面留下了印记。

最后还要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在 1860—1911 年期间，还有一些外籍移民也进入了东北，他们主要来自朝鲜、俄国和日本。本文的探讨中并未涉及到他们。本文所使用的“东北移民”这个概念，指的是中国籍移民，在文中各处所提到的东北移民均不包括外籍移民。不过，外籍移民在东北近代社会文明的建构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情况是值得研究的。

Migrants and Moderniz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1850-1911

BAI Hongzho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Migrants had poured massively into Northeast China since the ban on migration to that area was lifted in 1860. When modernization developed in that area on a large scale, migra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from 1860 to 1911 in terms of population increase as well as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urban and other developments. But it is also argued that migration was not the leading force and main driver of modernization in that area because of specific requirements of moderniz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migrants themselves. However, migrants did endow moderniz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a plastic feature at that time.

Keywords: Migrant; Northeast China; Modernization; 1860-1911

收稿日期: 2006-01-06

作者简介: 白宏钟，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讲师。